

庄国土教授访谈录

郑一省 张龙腾

[中图分类号] D634

[文献标识码] D

[文章编号] 1002-3925(2012)02-0003-03

庄国土,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他1980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1982年获厦门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89年5月获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1993年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现为华侨大学讲座教授、厦门大学特聘教授,历史学、政治学博士生导师,并任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院长、厦门大学马来西亚研究所所长、苏氏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国家“985”社科创新平台(东南亚研究)主持人兼首席专家。兼任教育部人文社科委员会委员兼国际问题研究学部召集人、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东南亚研究会会长、中国华侨华人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亚太学会副会长、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副会长等。2011年11月被特聘为广西首批“八桂学者”。

近期我们受《八桂侨刊》期刊的委托,专程前往厦门访谈了庄国土教授。

采访者:庄老师,您好!从您的学术经历和成果来看,您研究的方向主要为中外关系史和华侨华人。请您谈谈,您为何从事这些方面研究?

庄国土:我研究中外关系史以及华侨华人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中国历来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民众活动基本不被官方重视。中外关系史主要是关注朝廷对外的交往,民间的国际交往却被忽略。因此,官方对海外民间活动的记录很少,更别说量化的统计。西方则不一样,西方各国在对外扩展时期对当时的民间海外活动进行了完整而详细的记载,比如对东印度公司和海外贸易商的记录。所以,我认为民间的海外活动应当得到重视和关注。其二,我出生在福建晋江,后来我到厦门学习、工作。晋江和厦门都是中国著名的侨乡,身在侨乡的我,侨乡是促使进行华侨华人研究的个人原因。此外,闽南是中国最早和最长时间进行大规模国际交往的地区,这可以追溯到13世纪,尤其是南宋以后,可以说,闽南是中国民间对外交往以及海外开拓的主力,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19世纪。虽然闽南是中国率先国际化的地区,但在中国政治版图中并没有相应地位,因此,我愿意探讨闽南民间对外交往的历史,并决定以华侨华人为窗口来进行中外关系史的研究。

采访者:庄老师,您能否给我们谈谈“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问题”?

庄国土:无论是移民还是公共外交,事实上都与国际关系有关,现在国际关系越来越重要,可以说是核心问题。2008年9月29日中央“五侨”主席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办侨务工作与改革开放30周年座谈会,全球的媒体都对此给予了关注。我们曾经整理出有关华侨华人的数据,这些数据经新华社发布后,被全球各大媒体转载。为什么这么多媒体会关注华人的数据?2008年我曾作过一次演讲,演讲主题与这个有密切关系,就是华侨华人口有多少,分布在多少个国家。其实,华侨华人实际上已成为中国外部最重要的

[收稿日期] 2012-06-10

[作者简介] 郑一省(1959-),男,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张龙腾(1987-),女,厦门大学人文学院,2009级人类学硕士生。

合作伙伴。华侨华人既是中国重要的海外资源,也是最重要的国外合作伙伴。我们对华侨华人的重要性已经做了计量分析,包括他们的总人口数据和经济财力,关于华人专业人才方面的信息我们正在做,等人才方面的计量数据分析完成,就更能了解华侨华人对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性作用。

华侨华人之所以是中国最重要的国际伙伴,这是可以被计量证明的。如果华侨华人是中国最重要的合作伙伴,那么他们就应当是中国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研究对象。有关这种重要性,我们可以从国际关系中的公共外交、从中国对外关系中华侨华人所具有的地位、从华侨华人本身的政治潜力以及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和前景这些方面来分析。比如,在国际安全方面,特别是中国的战略安全方面,华侨华人起着重要作用。在中国的周边地区现在有大量新移民,目前至少有100万,如果是200万的话,那么他们的战略价值是非常大的。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海外数量庞大的华人,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在中国的国际安全战略中、在中国的国际经济发展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海外华资企业成为外资进入中国的排头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引的外资近70%是包括港澳台侨资本在内的海外华资,这就可以看出他们曾经在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或者国际政治中扮演的角色。在中国加入WTO后,也就是世人所说的,中国的市场经济已趋于成熟,而中国市场经济形成的核心竞争力仍然主要是海外华资企业,因为他们在国际经济中才是真正具有竞争力。

为何说华侨华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是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整个的学术逻辑就在这里,而它的现实意义就是提醒中国朝野应当对海外同胞给予关注。因为历史上长期的帝国形态和中央集权使得我们对海外侨胞的关注很少,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漠视,好像他们天然就应该被遗弃或利用,我们还没有学会用平等、合作的态度对待他们,反而要求他们提供更多的服务。所以,中国与华侨华人关系的核心就是华侨华人是中国的最重要的国际合作伙伴,其重要性超过任何一种中国的对外关系,包括对周边的关系。鉴于华侨华人高度集中在东南亚和日韩,中国与华侨华人的关系实际上也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一种表现。

采访者:庄老师,华侨华人在国际关系中具体扮演着什么角色,可以谈谈一些具体案例吗?

庄国土:华侨华人分别在国际经济关系、国际政治关系以及公共外交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首先,谈谈国际关系中的国际经济关系。海外侨资进入中国并建立侨资企业,这些侨资企业是中国经济的主力,也成为中国世界工厂的核心企业。所以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海外侨资企业是中国经济的主要竞争力和主要体现之一。其次,华侨华人在国际政治关系中非常关键。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好的周边关系,比如与东南亚的关系。东南亚当地华侨华人在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中起着桥梁、斡旋的作用,这是尽人皆知的。中国国家领导一行到东南亚一般选择下榻于华人酒店,从这就可以看出华人的重要性。中国和东南亚外交关系的正常化,我想当地华人的斡旋相当重要。当地华人与当地政要有着密切关系,他们一般是具有政治背景的华人豪商。比如在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都有一批华人在斡旋,美国的“百人会”在美国对华政策上有一定的影响,比如骆家辉、赵小兰以及某些知名教授等。“百人会”的目的就是推动中美关系,其作用无可限量。但是骆家辉却被国内媒体指责,这是很可笑的,我们应该换个角度来思考骆家辉对中国的影响,他的平等、人权和民主意识对中国政治是有所启发的,我们现在不仅要引进海外资本,还要引进他们的文化。中国本土与海外华人在认知理念上有很大的差别,目前大陆文化有向皇权文化靠拢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特别需要较具人权、平等和自由观念的华人文化的启发。再次,华侨华人在公共外交上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公共外交也就是第二外交,比如美国的“百人会”就是通过中国民众、中国形象来演绎中国软实力,然后使得中国形象得到提升,这样无论是华人还是中国形象都会得到改善,这也是国际关系中软实力的体现。

采访者:庄老师,“软实力”是国际关系的一种,能否请您谈谈“软实力”与华侨华人的关系?

庄国土:我们讲 Chinese Soft Power,就是指中国软实力、中华软实力或者“大华人”软实力。“中华软实力”包括大陆文化和华人文化。我们大陆和海外华人都具备共同的传统文化特征,比如勤劳、节俭、尊老爱幼、重视教育、关注家庭、关注社区、重视亲情和伦理等,但真正较好地保存这些优秀品质的却是海外华人,并且他们还具备中国本土文化所没有的特征,比如他们吸收了西方文化的自主、平等、遵纪守法等品质,这些恰恰是大陆所缺少的。所以,用华人文化软实力或华人文化优秀因素来改造现在的大陆文化是值得提倡的。相反,只会背诵四书五经是没有用的,我们需要发展新的文化因素,在这方面华人做的更好,他们接受了更多的人类

共同的先进文化和文明,因此,同样作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者,华裔的优秀因素很明显。这就是我关于“中华软实力”的一个整体思路,无论是中华文化还是中华民族,为什么它们都能够生生不息,一定有它的生命力所在。我们就要找出中华文化的生命力的根源,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些优秀因素,这些优秀因素通过代代相传才能起到凝聚中华民族的作用。因此,就这方面而言,吸收海外华人优秀文化就是我们的战略问题。

采访者:庄老师,在华侨华人研究中,国外学者和国内学者各自的优势在哪里?

庄国土:在华侨华人研究中,国外学者在语言方面有优势,20年前中国学者在语言能力方面与外国学者的差距较大,但是现在这种差距越来越小,因此,我对中国学者在华侨华人这一领域的研究充满信心。另外,国外调查团队的规模较小,国外学者通常不得不单干,但大项目需要采集大量的样本和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搜寻资料,单凭一己之力远远不够。相反,国内学者较有机会组织大的调查项目,比如我们花了5年时间,组织团队到福州进行新移民的调查,我们在10多个村庄共搜集3000多个样本,足够的样本才具有说服力和证明力。此外,国内学者在搜集和整理中国文献上有一定的优势,在个人力量不够的情况下,我们能够组织团队搜集分散的文献并进行集中整理,国外学者缺乏这方面的条件。

采访者:庄老师,现在如果进行“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的研究,应当从哪些方面着手?

庄国土:如果现在要进行“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的研究”,我们可以从各个二级学科来开展,包括理论和实证方面。比如可以将全球化、软实力、区域一体化等理论融入到国际关系理论,这些理论都与华侨华人有密切关系,比如全球化理论中的资本、人才、技术、信息流动等都与华人有关,又如地缘政治理论也是可行的。华侨华人的研究可以从任何一个二级学科来开展,因为华侨华人是一个研究对象,我们可以从各个学科的角度来研究华侨华人,这也是我的一个想法,目前我也正着手这方面的研究。

采访者:庄老师,研究“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问题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庄国土:任何一项政策都会有副作用,比如民主制度不一定是最好的制度,重要的是我们怎样尽量减少甚至避免不利因素以及如何发挥积极因素。比如我们传统意识中较为强烈和明显的“民族主义”“专制主义”“帝国意识”等看待华侨华人,对华侨华人会有不利影响,如果我们以帝国心态和意识对待他们,他们就会被别人当做中国政府的忠诚者,这对华人和中国双方都是不利的。如果我们将华人看做他们所在国的一部分,华人在当地社会就能得到更好的发展,那么华人在中国与当地的关系中将会扮演他们的最佳角色,这就有利于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就中国与东南亚关系而言,东南亚的华人已经与当地融为一体,近30年来我们与东南亚关系也处理得不错,如果没有南海问题,我们与东南亚的关系就会更好。

采访者:庄老师,能否请您谈谈目前国内华侨华人研究的问题及前景?

庄国土:近20年来,国内华侨华人的研究虽然取得不少进展,但依然存在较多的问题:(1)重复研究、创新水平较低。近10年来,国内出版关于华侨华人的著作上百种,发表论文数千篇,但大多都是老生重谈,甚至低水平重复。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部分学者缺乏系统的学科训练,思辨能力较低;二是国内学者对国外已有研究成果的掌握较少,这也与部分国内学者外语水平低下有关,语言的障碍使得国内学者与国外学界的交流不够,不能及时掌握国外学界的信息和资源;三是国内学者搜集新资料的力度不够,使用同样的文献和资料,著作和论文的内容难免重复;(2)急功近利的研究态度。相对于学者自身能力和条件而言,急功近利的研究态度则是科研创新的最大障碍。近年来,重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经费增多,科研条件得到改善,但并没有取得较为明显的研究成果,这与科研者自身的治学态度以及目前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术评估体系有关。华侨华人的研究相当复杂,它涉及不同学科以及中、外资料,这需要研究者潜心研究,但大部分学者急功近利,急于将未成熟的研究成果推出以换取现实利益;(3)国内学者对第一手资料的掌握不足。老一辈的学者非常重视对第一手资料的挖掘,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学术评估体系等原因,较少有学者愿意去挖掘和整理原始资料。就中文文献而言,仍有大量的资料值得我们去挖掘,比如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的洋务、使领人员的文献、回忆录以及新中国时期的外交人员的回忆录等等。在外文文献方面,欧洲各东印度公司的档案、列强的有关东南亚殖民地的档案等等都有待利用。在华侨华人的现状研究方面,第一手资料往往来自田野调查,比如对“移民”和“华资企业”的研究,但田野调查耗时耗力耗财,学者大多不愿为之。